**目录**

**[理论探讨]**

**中国共产党廉洁百年探索的动力、历程与启示……唐贤秋 (1)**

**[党史学习教育]**

**以“西迁精神”激发创新发展的动力…………………张天社(17)**

**延安时期俭以养廉的历史经验………………………韩 伟(19)**

**[廉政文化]**

**谈廉政文化与廉政建设………………………………雷 原(24)**

**企业发展与廉洁文化建设分析……包卫兵 包秀文 徐培华(29)**

中国共产党廉洁百年探索的动力、历程与启示

**唐贤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1921-2021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一瞬间，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却发生了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再到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力量很多，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则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廉洁政治探索的重要密码。值此全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探寻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追求的内生动力，回顾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百年探索历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开辟廉洁政治新天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的内生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也是坚持不懈进行廉洁政治探索的一百年。廉洁政治，是指以廉洁作为价值目标的一种政治追求及其形成的政治风貌。廉洁政治探索，是指围绕廉洁政治价值目标进行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百年如一日地坚持廉洁政治探索，源于其强大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是指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目标所激发出来的内在力量，它来自于主体内部能量集聚而非外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如一日地坚持廉洁政治探索的内生动力，源于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为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而做出的庄严承诺。

**（一）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遭受深重苦难之中，这种苦难境遇是，腐朽无能的满清封建王朝闭关锁国，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满清政府签订各种丧权辱国条约，中华民族陷入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满清王朝，却依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面貌，军阀割据混战，政治腐败不堪，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当成肥肉一样瓜分，“俄叱其北，英伺其西，法啖其南，日据其东。处此飘摇震荡之时，岂非今日千钧一发之中国乎？至如此之时，处如此之势，政府人民，犹复鼾睡不醒，作党争、权争、数争不已，继之以教争，欲吾中华之不亡也，其可得乎？”于是，为中华之崛起，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中国，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发出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已深深懂得，政治腐败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中华民族要摆脱这种局面，必须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第一步，则是争取民族独立，废除资本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消灭贪官污吏的国家，可见，建立一个消除腐败的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萌生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不仅将这一初心贯穿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程中，而且贯穿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历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实现廉洁政治”的主张，并毫不犹豫地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亮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临的各种诱惑与挑战骤然增多，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建设廉洁政治初心不改，始终同各种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反腐倡廉贯穿到整个改革开放大业中，认定“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改革开放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反腐倡廉贯穿到改革开放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之中，是因为腐败对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复兴产生腐蚀作用，而反腐倡廉则可以为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并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总之，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建设廉洁政治的巨大动力。

**（二）为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已明确的价值立场。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要求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要求，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富起来。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要求，经过艰辛探索，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精准扶贫方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最终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开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目标新征程。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正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因为在廉洁政治探索中，推进制度建设和完善监督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权力运行，促使党员干部公正用权和廉洁用权，更好地运用手中权力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加强廉洁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用权的自觉性，进而增强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其实就是对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零容忍”，因为腐败现象败坏社会风气，污染政治生态，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正如习近平所言：“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反腐败是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对发展成就的获得感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感。

总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初心和使命乃至奋斗目标，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进行廉洁政治探索的强大内驱力量。

**（三）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庄严承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历史思维，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把握历史规律。尤其从李自成失败与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轮回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以期走出历史周期律，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懈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历史动因。对李自成失败的总结，起于《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中国农历甲申年，距离1644年李自成战败整整300年，那一年也正是甲申年，郭沫若以历史学家的特有思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该文以丰富史料揭露了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李自成在此废墟上建立大顺农民政权仅存40余天而败亡，郭沫若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败亡，两者都是自己败给了自己，明末官场“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是“纵贪横于京畿”，李自成则在取得一连串胜利后，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纷纷然，昏昏然”。因此，明朝之亡和李自成之败，都根源于自身腐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发表后，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极大影响，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中国共产党决心以李自成的悲剧作为反面教材，时刻提醒党内同志要引以为戒，“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历史之所以是一面明镜，是因为通过历史可以总结过去的得失且照亮未来前行的路，中国共产党时刻提醒党员要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中汲取教训，以开创未来。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谈到，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大凡初期都聚精会神，办事尽心尽力。然随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渐渐放松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却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还没有谁能跳出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则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绝不仅仅是对黄炎培的回答，而应该说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世人做出的庄严承诺。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强调要提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坚持做到“两个务必”？为什么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中国共产党执政始终当成“赶考”而坚持了下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百年如一日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时刻以史为鉴，提醒共产党人读好历史这本“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的教科书，以“战战兢兢，生怕出岔子”的心态，来履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庄严承诺！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百年探索历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百年探索分为四个阶段:(1)1921-1949年，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形成与局部实践。(2)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发展与实践中遇到挫折。(3)1978-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党的廉洁政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实践中立体推进。(4)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党的廉洁政治理论成熟与实践中一路豪歌。

**（一）1921年建党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形成与局部实践党的廉洁政治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形成。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废除资本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除阶级差别。”这些主张自然包含了与私有制及其所产生的腐败彻底决裂的立场，党的二大通过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纲领，其实都包含了坚决反对腐败的主张，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军阀是内乱的根子，是腐败的代名词，私有制是腐败的总根源，而反腐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廉洁政治。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毛泽东重申“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主张。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强调“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可见，建立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已确立的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目标追求融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顺利推进，党的廉洁政治理论逐渐明晰起来。一方面，对党内何以产生腐败问题有了一个初步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与腐败格格不入的政党，但党内的确存在腐败现象，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之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刘少奇也指出：“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没有一刻钟不是处在严重的战斗环境中，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些其他各种阶级，便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分，侵入到党与无产阶级的内部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里所说的“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与“各种机会主义”，自然包括党内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对党内如何防范腐败问题有了一个认真思考，那就是加强作风建设，主张人民监督，严惩腐败分子。之所以强调作风建设，是因为“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整风的形式来加强作风建设，要求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入党，也在思想上入党，号召广大党员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认真检查和克服自身的问题。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强调“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关于人民监督，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解决“人亡政息”问题的根本之路，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来跳出历史周期律！

由此可见，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形成，当时，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执掌全国政权，但从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已经建立了局部政权，且党的廉洁政治理论也在此进行了局部实践，其中包括探索通过党的纪律和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及建立不同的监督方式来规范权力运行。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来增强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通过严惩腐败分子来整肃风气，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任何腐败分子的莠草生长！有了，就要拔掉它！这个时期的廉洁政治实践探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更为日后成为执政党建设廉洁政治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发展与实践中遇到挫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诱惑与挑战大大增加，从而需要对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做出回答，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在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艰难推进。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资产阶级纷纷出来捧场，不断用“糖衣炮弹”向一些共产党人进攻。党内自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表现为“四大情绪”生长，即“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上进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一些党员干部那里生长，对此，党的领导人深刻分析了产生腐败现象的社会原因，即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旧社会的种种恶习也会侵袭人民的干部队伍，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打开非法牟利的方便之门，用种种手段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我们队伍中的个别不纯分子开始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而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思想根源，则是因为一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并没有从思想上入党，他们入党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于是在革命胜利后表现出骄傲自满、停顿起来不求上进、以功臣自居等思想情绪，从而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成为俘虏，堕落为腐败分子。

如何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避免腐化变质而“不当李自成”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必须回答的实践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旨在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风、整党、“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性运动，通过整风整党运动加强廉洁政治教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的廉洁政治探索的一大特色，在整风运动中，通过整顿干部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党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和廉洁教育，通过整党运动，对全党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观教育，结合整党运动，党还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通过这些措施，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还在立法建设上进行了有效探索，通过加强廉政立法建设和设立专门反腐倡廉机构等来建设廉洁政治，制定了一些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惩治贪污的地方性法规——《中南军政委员会惩治贪污条例》及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对贪污罪的界定和基本原则等法律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对于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加强权力监督，建立了党内监督机构、行政监察机构和各级监察机关，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权力监督体系，从而有效推动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政治建设，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效，查处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腐败大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整肃风纪、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大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很好的反腐倡廉教育。然而，这一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主要依靠群众运动方式进行，也留下了深刻教训，群众运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盲目性和非规范性，如“三反”运动对当时腐败现象做出不切实际的夸大估计，扩大了不应有的打击面，当群众运动作为解决党内问题的主要方式来推广时，其负面效果便凸显出来，廉洁政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需要，党的中心工作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中共八大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工作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廉洁政治建设必然要服务于发展生产力需要。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偏差，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阶级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革”内乱，使反腐倡廉服从于阶级斗争需要，民主监督被群众运动所取代，不仅不能有效制止腐败现象，反而打乱了正常的民主秩序，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不能正常开展，党的廉洁政治建设遇到前进道路上的巨大挫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结束了十年内乱，及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拔乱反正，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新转机。

**（三）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党的廉洁政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实践中立体推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时把党的中心工作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多重叠加，党内腐败现象呈现滋生蔓延趋势，如何经受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以防范腐败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这一时期党的廉洁政治理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反腐败斗争何以成为迫切需要？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何在及反腐倡廉的系统化进路如何设计等。ꎮ

1.反腐败斗争何以成为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将腐败问题与党风问题联系起来，并做出一系列重要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将反腐败斗争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凸显了我党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和责任担当。

2.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何在

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我们国家是从具有长期历史的封建社会发展而来，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将长期存在，并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封建思想残余影响正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党内滋生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体制乃至制度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正“由于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同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也有主观原因，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相对薄弱分不开，使得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开始变得松懈起来，以追求腐朽生活方式为荣，从而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走向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这些关于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源分析，为反腐败对症下药提供了靶向。

3.反腐倡廉的系统化思路如何设计

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要将反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提出要完善法律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廉洁教育和严惩腐败等系统化思路，即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关于完善法律制度，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规制，要克服官僚主义、铲除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通过健全民主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并通过体制创新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关于监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拥有了很大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势必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此，“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而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正是为了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关于教育，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教育是与法律并行的治本手段，邓小平指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腐败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因为，教育可以解决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引导党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从而更好地增强他们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以上表明，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已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党的廉洁政治建设实践也在制度、监督、教育和惩治等方面立体推进。首先是制度建设的推进：主要是建立国家法律制度与党内法规相结合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促使廉洁政治建设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轨道，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修正案》《刑事诉讼法》等，为惩治腐败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出台了《公务员法》《反洗钱法》《物权法》《反垄断法》等，为反腐倡廉提供相应法律依据；颁布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任期、交流、回避等制度规定，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党内法规，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提供基本遵循，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相互衔接，构筑了我国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其次是加强监督的推进：在重建监督机制基础上，建立多维度的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纪检组织，强化人民检察院和国家行政监察机构建设，专门设立审计监督机关，以强化监督职能，在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监督方面，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相结合、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并以法律制度形式将各种监督方式确定下来。特别是在党内监督方面，中央创设了巡视制度，通过巡视形式对省级领导班子及成员的选拔任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和廉政勤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加强地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权力监督及防范腐败现象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是廉洁教育的推进：主要是创新廉洁教育形式，继承党的以整风形式加强作风建设的传统，通过发动群众参与但不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三讲”教育形式加强作风建设，要求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并要求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提出对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践行“八荣八耻”，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大力开展廉政文化活动，并以制度的形式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固定下来，成为改革开放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确定了明确尺度，这一时期廉洁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推出了一系列廉洁从政模范人物，如孔繁森、吴天祥、郑培民等，他们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固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人民心中铸起了一座座精神丰碑，为共产党员廉洁从政树立了生动榜样。是惩治腐败的推进，针对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出现的各种犯罪活动，党中央及时进行“严打”，狠刹各种经济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惩治了贪污腐化等各种腐败行为。针对改革中一些干部乘价格双轨制之际进行“官倒”现象，党中央及时进行果断处置和有效治理。针对一些行业公职人员凭借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等现象，党中央通过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来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严格整治商业贿赂及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以净化社会风气，在反腐败斗争中，严肃查处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四）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至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党的廉洁政治理论成熟与实践中一路豪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同时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为了应对考验和化解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反腐倡廉大旗，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1.不忘“赶考”精神，突出反腐防变的理论逻辑

随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期，各种矛盾和社会利益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叠见，党内腐败现象呈现易发多发趋势，有的甚至出现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和塌方式腐败现象，对此，习近平严正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告诫全党要“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把反腐败斗争摆在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避免“亡党亡国”的高度，是因为时刻牢记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告诫和“进京赶考”的精神，在习近平看来，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以要求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2.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对腐败现象必须坚持零容忍，保持高压态势，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从而真正起到“不敢腐”的震慑作用。针对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与制度不完善有着很大关联，从而给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留下制度的漏洞或空隙，正如习近平所言:“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要把制度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管不住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扎牢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于是，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来规范权力运行，通过健全监督机制来制约权力，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制度与监督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党中央不仅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和“不能腐”的约束，而且突出强调“不想腐”的自觉。因为，“不敢腐”的震慑力和“不能腐”的约束力，都是一种由外而内的他律约束，是一种外在作用力，这种外在作用力最终要通过内心吸收接纳才能产生效果。而“不想腐”的自觉则通过由内而外的内生力量发生作用，从而在内心深处自觉筑成防范腐败的思想堤坝。在习近平看来，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奉献意识，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自觉做到公正用权、为民用权和廉洁用权。习近平强调指出：必须推动形成不断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党性觉悟，“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申“赶考”精神，强调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标志着党的廉洁政治理论已经成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党的反腐倡廉实践也在“破”“立”结合中一路豪歌向前。

一是“立”，即立规矩、立标准、立目标、立榜样。(1)立规矩。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加强作风建设入手，制定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根据扎牢制度笼子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就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巡视工作、纪律处分、党内监督、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颁布一系列条例，并制定且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这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起，构成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2)立标准。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新标准和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后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用“三严三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句话，“三严三实”标准，就是要求共产党人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3)立目标。确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目标。习近平指出：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必须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4)立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习近平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中央政治局领导带头执行，以上率下，在党内外产生巨大示范效应，为了树立先进典型，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为新时代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点赞，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王继才、黄大年、廖俊波、李保国、黄文秀等一个个时代楷模，为共产党人勤政廉洁为民树立了榜样的力量。

二是“破”，即破除顽疾、破除藩篱、惩治腐败。(1)破除顽疾，即破除思想作风顽疾，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顽疾。该教育活动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根据“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着力解决“四风”问题，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破除藩篱，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所造成的利益固化藩篱。一些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产生，往往与体制机制的弊端有关，如一些权力部门不愿意简政放权、还权于民，存在着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利益固化藩篱。“利益固化藩篱作为一种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已成为横亘在改革路上的险滩路障”，也成为公权私用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对此，党中央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阻碍反腐倡廉推进的种种障碍。(3)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腐败宣战，不仅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对腐败现象保持高压态势，而且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做到反腐无禁区、零容忍和全覆盖，同时，在“打虎”行动中坚持做到清流毒、平山头、破圈子、铲码头，这样，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一路豪歌，使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百年探索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百年探索给我们以深刻启示，那就是，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的强大精神支柱，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获得力量供给的最大底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行稳致远的核心法宝，在深化标本兼治中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建设取得根本成效的关键密码。

**（一）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的强大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坚持廉洁政治百年探索决心和信心不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即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路明灯照亮了共产党人前进的路，而且是前进道路上的罗盘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航向。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然要求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树立正确的地位观、权力观和利益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要求使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的根本价值目的，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社会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这必然使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增添了勇气和底气，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主张，人应当成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而揭示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忘入党初心，坚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的革命的人生观。”可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理想信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共产党员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看待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丧失理想信念，经受不住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的考验，经不住各种诱惑而沦落为腐败分子，走向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对此，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应当“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因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廉洁政治百年探索的根本精神支柱。ꎮ

**（二）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获得力量供给的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并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的供给。”同理，只有广泛地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在廉洁政治探索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供给。当然，人民群众在党的廉洁政治建设中的主体性发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人民群众处于主体地位，明确自身的使命担当。(2)廉洁政治建设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人民群众主体性发挥的根本动因。(3)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创造条件，这是人民群众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直接依据，据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摆正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仆”位置，即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人，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公仆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这一宗旨出发，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其根本要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和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党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因为它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执政党哲学终极问题的精准回答。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价值立场，并由此获得巨大的内生力量，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无穷智慧和力量，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勤务员，而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人，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员“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因没有把握“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核心要义，颠倒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主次关系，以一种当官做老爷的心态主持工作，滋长了官僚主义习气，脱离群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党的形象，损害党群关系，削弱党的政治优势，这种脱离群众与腐败并列的危险，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嵌入作风建设、坚决整治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弊病的根本缘由，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因腐败侵蚀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最反感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事情漠不关心，因此，人民群众是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必须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权力，促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正是毛泽东主张“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以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据，同时，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反腐倡廉的智慧，因为人民群众是智慧的源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总之，为了人民，就能赢得人民，依靠人民，就能汇聚人民的磅礴力量，增添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巨大底气，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因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就能无往而不胜。”将人民与江山等同起来，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江山与人民之间内在逻辑规律的精准把握，即为了人民就是为了江山，巩固江山必须依靠人民!

**（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行稳致远的核心法宝**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廉洁政治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党的性质、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及党肩负的使命，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所以说要坚持党要管党，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同样关键在党，只有党自身坚强，才能担当起领导重任，如果放松自身建设，党就不会有坚强战斗力，尤其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多重考验，党能否管好自己，必然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一旦管党不力，党内各种不健康思想就会滋长，就会出现党组织涣散软弱，就会有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等等，因此，党要管党，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发展经验教训所得出的结论。之所以要坚持从严治党，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属性决定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否则，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党内各种问题就会滋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式微，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也会随之丧失，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党政权的丧失，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坚持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列宁也认为，“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要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共产党员犯法“更要追究法律责任”，且“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员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坚持从严治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便有“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条文，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对党内不纯分子和腐败分子严厉打击，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障因素。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很好地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当今我国正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发展环境，在国际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各种新矛盾新挑战，在国内，我们已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不少新特征新要求，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处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及自身建设水平和领导水平，针对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等危险，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永葆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可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不能削弱，“全面”是指管党治党必须面向所有党员干部，涵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抓住“关键少数”，将“严”字贯穿在管党治党整个过程，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中“严”当头，决不敷衍，“治”是指“治理”“整治”，即治理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整治各种不正之风，整治党内腐败现象，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发展中能够不断走向胜利是因为握有三大法宝，那么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探索行稳致远的核心法宝。

(四)在深化标本兼治中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建设取得根本成效的关键密码

廉洁政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思维方法来推进，系统思维是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指从系统观点出发，把系统的整体结构、运行和整体最优化目标放在突出位置，系统目标的实现不是系统各要素性能的简单相加，而是系统各要素功能的有机统一，整体性原则是系统思维方式的核心，它需要从整体出发来把握系统各要素的内在关联，从而在增进系统各要素有机统一中实现整体目标。

廉洁政治建设之所以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因为它涉及权力运行、法律、道德、制度、监督约束、思想教育与惩治等系统要素，而每一个系统要素又包含着子系统要素，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发挥不同的功能影响，组成系统的整体结构，在廉洁政治建设系统工程中，整体目标是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需要从倡廉与反腐、预防与惩治、治本与治标等方面协同发力，这其中需要系列要素的整体跟进，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切实解决人民利益诉求问题，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反腐倡廉整体推进的各种藩篱，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坚持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促使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坚持反腐的系统性，既要猛烈“打虎”，又要时刻“拍蝇”，还要不忘“猎狐”，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合作等等，这一切需要在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监督机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坚决惩治腐败等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及其结构与功能有机统一中，进行系统把握和整体推进。

中国共产党从系统思维方法出发，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即在反腐倡廉中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惩治腐败，又要加强预防，制度、监督、教育与惩治构成廉洁政治建设系统工程的四大关键环节，其中，扎牢制度笼子是根本，其功能在于为权力运行提供制度框架和行为边界。健全监督机制是关键，其主要功能在于防范权力的滥用。加强教育是基础，功能作用在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制度、监督和教育是治本之举，共同组成预防腐败的“防腐墙”，而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加强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则是为了增强震慑作用，属于治标之策，治标和治本，是反腐倡廉系统中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两个方面，只有抓好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有效抑制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才能为治本创造条件，只有抓好治本，从源头上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坚持标本兼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系统思维方法出发对反腐倡廉规律的有效把握，标本兼治，急在治标，重在治本，“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一手抓惩治，一手抓预防，两手都要硬，是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有效方法，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制胜之道。”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习近平强调：“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对新时代反腐倡廉坚持系统思维突出标本兼治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破解反腐倡廉难题的关键密码。

(本文摘自《唐都学刊》2021年第三期，作者唐贤秋系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西迁精神”激发创新发展的动力

**张天社**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交通大学师生响应党中央号召，登上西去的列车，从黄浦江畔的上海来到渭水之滨的古城西安，开始了“建设大西北”的历程，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交大西迁”。60多年后，西安交大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讲述他们扎根黄土地，向科学进军，建设西部科技高地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感动，为交大老教授点赞，希望他们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20年春意盎然的4月天，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专程前往西安交通大学，考察交大西迁博物馆，看望西迁老教授代表。他明确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勉励大家要弘扬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为中华民族立下卓越的贡献！

习总书记反复强调“西迁精神”，对激励和鼓舞西安市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大西安追赶超越新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弘扬“西迁精神”，用“西迁精神”武装头脑，推动实践，指导工作，争做新时代“西迁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弘扬“西迁精神”，就是要坚持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坚守听党指挥跟党走这个精髓。60年多前，交通大学6000多名师生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义无反顾地背起行囊，不讲价钱，不讲条件，毅然踏上西迁的征程。“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交大西迁老教授这三句感人肺腑的话，就是对听党指挥、舍家为国的爱国主义最生动的写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在实现西安追赶超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时代新人。我们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去，形成万众一心、万马奔腾之势，以科技创新引领西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西安这座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弘扬“西迁精神”，就是要坚定义无反顾，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西迁教师、院士谢友柏回忆所说：“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的富强不顾一切去奋斗的精神。”交大刚到西安时，没有校舍、没有实验室，更没有家属楼，新的交大是在当时西安东郊一片麦田里建设的。西安交大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教授亲自踏勘校址，组织迁校、建校。热工先驱陈大燮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舍弃了大上海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偕夫人一起来到西安。时年已66岁的沈云扉教授得知迁校消息后，毅然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西迁。这种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这种不怕艰苦、战胜困难的创业精神，正是我们创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改革先行先试区，建设“一带一路”综合改革示范城市，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强化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所必须具有的时代精神。

弘扬“西迁精神”，就是要满怀豪情和梦想，具有必胜信念和乐观向上的自信精神。交大西迁时，不光有教育家、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他们都满怀“建设大西北”的豪情壮志，满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踏歌西去，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这种乐观自信的力量，这种必胜信念的支撑，造就了西安交大科技创新赋能西北经济发展的局面。在西安进入万亿元俱乐部，[成为西北首个GDP破万亿城市](https://www.so.com/link?m=bldN3gvjnzHLsNID/3CQQzNtbnw046bbX3XxdJsoWakk3J+JgKD99mAgGj7NXr/2mE8Y3VmSmmWVMFaN094zoOM0xahsV99J6BJxIGm7yotGDZ3iNLo8tksQZk240XMEWcYe8Vd3DvES/CKFRTCWxRhT6q+UNZfLGi2aFbyl9nA3s7v/0OIDlBlyRaUvkuTY2dgfT0yKnQpIRrOduWKN0oU3EbcYZwH8I0gsP3vk7lUOTguSx102VR7tcmR2s8lUY)后，更需要满怀豪情和梦想，满怀对未来美好愿景的期待，按照“6+5+6+1”现代产业布局，乐观自信地投入到“十项重点工作”中去，增强西安的“西引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构筑新时代大西安发展的战略优势。

弘扬“西迁精神”，就要具有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胆识、魄力和勇气。西安交大自西迁以来，能够不断进行科技创新，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改革创新是新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党中央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构筑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西安作为西北地区桥头堡，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承载新时代国家赋予的重要战略使命，我们必须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敢于破旧立新，除旧布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凸显战略支撑作用

弘扬“西迁精神”，就是要增强社会担当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上最讲奉献精神、最有奉献精神的先进政党。奉献是我们党的鲜明底色，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特质。奉献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信念。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无私奉献。西安交大从大上海来到古城西安，为大西北开发和建设贡献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奉献。”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西安要建成国家中心城市，我们就必须增强社会担当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感，树立“大奉献”精神，以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理解奉献、实践奉献、诠释奉献，用实际行动赋予奉献以新的时代特色、新的精神境界，才能放大我们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

“西迁精神”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脉相承，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丰富了新时代精神谱系的内涵。“西迁精神”所承载的爱国、奋斗、自信、创新、奉献的品质，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我们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并发扬光大。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延安时期俭以养廉的历史经验

**韩 伟**

俭朴与廉洁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俭”的要求就是厉行节俭为政，杜绝奢靡浪费，由此也成为通向“廉”的重要渠道。所以，俭与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一心为民的执政经历，即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政治自觉，也是对传统文化中以俭促廉思想的具体实践。

一、传统文化中俭与廉的辩证关系

俭以养廉，《左传》中，御孙曾劝谏庄公：“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这说明，俭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是有德者共同的道德，或者说有德者的养成很大程度得益于生活之俭。“俭以养德”，德以生廉，故私人生活中“节俭”的美德最终会导致公共事务中廉洁的效果。从人性的角度而言，生活简约，则善由心生，所谓“少则得，多则惑”；如果生活繁复、靡费，则容易导致恶念，明人吕坤曰：“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而言，俭则省约，外在的欲求会大为减少，为官者不能持廉的动机就大大降低。廉的达成，源自于最初的“俭”及对其深刻的体悟。

执政守廉，同样有促进节俭的作用。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更是将“廉”提到“国之四维”的高度，成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他认为上述四德或四维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最为重要的要素。“廉”在此被看作与“礼义”并举的最重要道德要求，因此它们必然与“俭”的反面——“奢侈”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也就是说为政“廉”的道德，内在地要求一种“俭”的生活、“俭”的作为。同时，廉则心正，心正则寡欲，欲求节制最终必然导向一种“俭”的生活。但是，如果树立崇高的为政目标，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简约生活也同样富有情趣，也因此，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清代陈宏谋才会有“敦节俭以为天下先”的豪言，只要心存“为天下先”的理想信念，即使生活再俭，也能体会刘禹锡陋室之得，亦能感受颜回穷居之乐。因此，廉可以促进俭，而且只有真正的廉政才能达成实在的“俭省”，而且在生活俭约的同时，还能达致某种心灵的满足与愉悦。这体现了传统廉政文化中俭与廉的辩证关系。

二、延安时期以俭促廉的历史经验

正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俭以养廉”的道理，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历来提倡并切实践行“俭朴”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时刻注意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大会上讲演时明确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朱德也认为：中国人民向来是勤劳节俭的。“食求果腹，衣求蔽体”的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和广大干部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成为每个革命者所追求的美德。朱德还曾赋诗一首：“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远是真言”，劝诫勤俭治国。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达到陕北后不久，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再次颁布了1933年在苏区制定的《反对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重申“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制定惩治办法”。

客观而言，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陕甘宁边区内外形势逐渐趋稳后，也出现了个别的奢靡浪费现象。边区财政审计报告说：米脂县委县府二个月吸三十四条纸烟；定边县公安局没收一百六十条纸烟，除送专署八十条，提成廿条，其余二十条全给县上县长吸完了。三边分区，请客之风很盛行，请客时，没有海参、鱿鱼即不算菜。三边某地委书记今年来延开会花一千万边币，其中有二百万元没有单据，都报销了。定边县前任某付县长结婚大请客，八个吹手，无鞭炮即叫特务员放盒子枪代替，光花边币八百万元，与原老婆离婚，还捎回家五十万元。这些虽多是个别现象，但引起了边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37年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1941年，林伯渠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报告，其中提到：“在生产自给方面，有些机关部队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只顾赚钱，作投机生意，而不注重生产实业，如开荒等。节约方面也放松了，浪费现象是很普遍的。如到处修石窑洞、大礼堂，一桌酒席就是几百元，而且流为风尚。”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人看到大生产运动后延安发生的这些浪费现象，十分忧虑，积极倡导边区厉行节约的方针，开展了节约运动，号召干部群众要养成节约的风气。林伯渠从节约财政开支的角度，具体规定了节约的原则和方法，减少了马匹和勤杂人员的使用；一切衣着用具交旧发新；减少会议和应酬招待，调整办公费标准。为了树立节约的良好风气，林伯渠首先从自身做起。1944年春，他将自己制定的《我的生产节约计划》贴在墙报栏里，其中有：“戒绝外来纸烟；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套、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他还附了一首节约诗，“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施肥除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在林伯渠等领导人的倡议和带动下，节约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进一步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与平衡财政收支以至移风易俗的法宝。1945年，边区政府共节约20亿元边币，相当于边区政府军队及各行政单位一年的服装费。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出，“要做到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不浪费一个民力和一匹民畜，建立经费核算制度，审计制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

延安时期厉行节约的政策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例如，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消灭浪费现象》的社论，提出要学习计划与管理，要在衣食住行、煤炭、点灯等各方面打算盘，一定要争取时间，追求效率。要把“节约”在今天的严重意义告诉每一个同志——从负责干部直到伙夫勤务员，号召大家互相督促、互相检查来认真地实行节约。共产党员与党的支部首先应该在这中间起模范与推动作用。1942年10月5日，为了避免秋收时粮食的浪费，《解放日报》再度刊发长篇社论《不让丢掉一粒谷子》，特别指出：“一粒谷子不是小事。…只要稍不留意，一亩地至少要损失半升谷子，全延安县也就至少要损失三千二百五十石，占该县公粮总数的七分之一。节约无小事”。陕甘宁边区正是通过秋收中的这些小事，逐步使广大干部群众养成勤俭节约的优良习惯。

为了更好地督促检查政府机关的节约运动，边区建立严格的审计与财务制度。1939年，为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困难，规定从六月份起各种特别临时办公等费要尽量减少，一切日常用品要想各种办法节省，以简单朴素为原则；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1941年12月，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其中提出“努力节约，度过难关”，要求：“除三十年度已动工之建筑必须继续完成者外，三十一年度一概停止建筑，一切临时支出，除非必不得已，概不批发。除招待外宾外，一切伙食、节日、纪念、结婚等等，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宴会。爱护公物、节省公物，建立各机关严格的移交制度，坚决的与浪费现象作斗争。”

延安时期的节俭为政还与精兵简政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了《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专门以一章规定了“力行节约”，提出：除保证给养外，其他消费，概须力行节省。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

按照精兵简政的总体要求，不仅人员被精简，政府一应日用也做到节约，粮食、燃料和日用品节省，在机关、部队、学校中广泛地实行，三五九旅用洋芋与南瓜部分代替粮食，就节省了一大笔粮食数目，使该旅粮食全部自给成为可能；边区办公厅、中央党校也实行了粮食节约措施；保安处等机关煤炭使用，由过去的每人每日二斤，减少到了一斤。在工厂，也实行了生产的节省，如边区被服厂一年就节省新布110010万方尺，等于42匹大匹布，节省线533码；边区纺织厂每天的废纱量，由过去的每天2斤多，减少到10两5；振华造纸厂锅炉改造后，每月节省木材5万斤。各机关、单位厉行节约的做法，有力地将精兵简政的政策向前推进。1944年，林伯渠又提出要将力行节约与生产自给结合起来，紧缩财政开支，减去或减低财政供给的比例，设立审计机关，严格财政开支；节约粮食，限制煮酒熬糖，实行储粮备荒；办公经费等也开展个人与集体的节约计划，通过奖励节约，组织节约运动。

延安时期，党的以俭促廉方针，特别注意从高级领导干部抓起，边区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并通过各种制度约束，防止高级领导干部的奢靡浪费现象。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俭”的倡导，更是对“俭以养廉”的率先垂范。1943年，谢觉哉为了生产节约，减少政府开支，特制订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将自己的两匹马列入总务处公马，供公家生产使用，每月10盒招待烟不要，衣服、鞋子、被单不领，并且自己种植蔬菜，晒腌小菜。在工作中，对于较高级别的干部待遇给以严格的规范，在各种生活待遇方面，厉行节约、杜绝奢靡。1942年2月，陕甘宁边区专门发布了“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匹及专署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其中要求正副厅长各得用马一匹，按编制名额每二十五人得用公马一匹，马夫一人；专署马二匹驴一头，县市政府马一匹，驴一头；长余或不足之马匹、勤务、窑洞、一律限二月底前呈报整编委员会处理。在革命领导人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员干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蔚然成风。

延安时期以俭促廉的宣传教育及法律规范，在边区各级政府公务人员中形成了很好的效果，实现了廉洁政治的最终目标：他们（政府工作人员）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劳作在一起。草鞋、背包、粗衣薄被是大家的装备。尤其是边区经济已经改善，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是每天一斤四两小米，七分洋钱柴菜，每月一元或二三元的津贴，还常常几个月不能按发。——如果说过去在战争中生活，一切不能不简单，而现在则和平的环境物质较丰，然而我们工作人员没沾染一点旧气，抱着“勤劳在先，享受在后”一直奋斗到革命成功的信念。有些绅士们经过县长几次“说情婉拒”，“进贿峻拒”之后感叹起来。有些劳动人民见我们生活太苦，说：“你们为何不派点款，难道你们最低生活我们都不能负担？”（如绥德）。有些外来参观者，实地看了这些情形，才恍然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以至于官民解除全无隔阂，废除旧的一切程式，尤其盛事。司徒雷登在比较国共两党的不同后，认为国民党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等弊病，“相形之下，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民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这使得节约为政不仅达到了廉政的效果，更使党和政府获得了民众宝贵的信任，密切了党群关系。

三、延安时期实现以俭促廉的原因分析

延安时期以俭促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延安时期，特别是大生产运动以来，陕甘宁边区迎来了经济、生产的大发展，物质资源匮乏的境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即便如此，共产党人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以及为民公仆的执政理念，厉行节俭。1941年林伯渠在给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有感触地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从人民手里拿来的每一文钱，我们都用尽一切方法，使它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保卫边区的用途上。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的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边区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生活的艰苦，已经达到十分值得表扬和同情的境地，他们的生活，很多甚至不如普通的农民或工人。他们之所以如此艰苦，也正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党也认识到在抗战艰苦卓绝的时刻，浪费的极端可耻与节约的重大意义：我们今天处在重重封锁之下，各部队机关学校的给养，都只能靠边区人民来解决，他们把自己血汗换来的一大部分粮食交给我们，宁可自己少吃，不愿增加抗战的困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如果不将每一粒粮食都用在抗战上，是不能回答全边区二百万人民的辛苦劳作的。正是由于这一高度自觉，使得勤俭节约不仅成为一项要求，更是边区党员干部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

延安时期实行以俭促廉，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普选运动，民主选举极大地教育了民众，调动了民众参与社会、关心国家、监督政府的积极性。边区政府的节约运动，也因为有民众的广泛监督，成效更为显著。1941年的选举中，绥德、清涧等地民众参加选举的百分比达到百分之九十五，选举淘汰了某些不称职或渎职的干部，改善了下层工作。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的批评了政府，积极提出了意见。民众的监督，对于克服形形色色的浪费行为，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廉政法制化建设保障了以俭促廉目标的实现。通过延安时期以俭促廉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节约、廉洁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依靠着宣传教育的方式，它更是通过各种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得到有效保障。1937年重申的《反对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及1941年的边区财政统筹统支办法等，都是这种以俭促廉法制化的集中体现。《反对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惩治贪污条例》特别将“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的行为列入贪污罪的10类主要行为，从而使惩治浪费公物的公务人员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一立法，在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以来的官员渎职立法中也算是一个创举。

四、小结

延安时期以俭促廉的历史经验无疑值得今天学习，我们还需要深刻理解和认识以俭促廉的时代价值。“俭”不仅在促廉中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稀缺的大背景下，继续强调“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节俭的品德对于廉政、廉德的养成只能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但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贪官污吏东窗事发时，仍然过着及其俭朴的生活，以至于周围人无法相信他会是一个受贿成百上千万的贪官。这说明有时候，“俭”不过是个人习惯或私德，它并不必然促成作为公德的“廉”。公私之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转捩点，但长期以来，公私不分的传统思维模式仍旧延续，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的观念，甚至使得“俭”的习惯反而变成“贪”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俭一定会贪，只是需要注意，干部生活的节俭未必一定能够导致为政清廉，廉政也不必然导致“俭”，对于二者需要客观地、辩证地区分看待。应该正确认识倡“俭”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评估其客观功效，而且也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反腐制度建设、执行力提升的主导性作用。这种对“俭廉关系”的反思，也深刻地反映在陕甘宁边区以俭促廉的历史实践中，这也凸显了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谈廉政文化与廉政建设

**雷原**

所谓廉政文化就是关于从廉政价值观到廉政之学、廉政机制、廉政制度、廉政生话方式、廉政文学与艺术的整体。它的核心是文化类型与社会制度。

纵观历史，在某些朝代中期之后，由于腐败问题的加剧，反腐力度的加强，政府的监察机构逐渐凌驾于正常的治理机构之上，而成为又一个更高层级的政府机构，如汉之叫“地方牧”的机构，本是监督巡查地方的，到后来地方为讨好他们，就给他们也设立署衙，时间久了便成为具有集治理与监察于一身的更高一级的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唐朝的节度使、清朝的巡抚等都是类似的政府机构。这一事实已是历史发展的常态。政府层级的增加，其弊之一，拉长基层官员进升路径，使一些官员不安心于基层工作，为了快速进升，拼命拉关系，大搞形象工程，为创造短期化的业绩，而不惜遗祸地方百姓，致使地方百姓怨声载道，今日城市化造景，有类于此。如有些地方政府，为建立经济业绩，不惜将农户几十代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毁之殆尽。其弊之二，信息流转环节过多，导致有效信息上传下达滞后，信息易失真，往往出现问题处理不及时、不对称。

随着腐败形势日趋严重，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反腐机构与反腐干部亦日趋增多。这本身应是很好的举措，但是，伴随反腐力度的加大，腐败形式与方法也日益多样而巧妙。有些反腐机构工作人员不能够正确对待党和政府赋予自己手中的权利，反腐变为贪腐，以反腐揽钱，以反腐打击异己势力，以反腐抢占经济资源，贪腐甚至渐趋产业化，一些“反腐机构”的腐败分子已蜕化变质，成为不法分子发财致富的工具。

廉政文化与治理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在两者关系中应以治理文化为主，如中医主治未病与治已病之关系。治未病，如治理，治已病，如亷政。国家治理进入正轨，廉政反腐自然减轻。但无论是治理还是廉政，其价值理念是相同的，都是强调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的价值观与大同的理想。正如习总书记所讲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宗旨。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非西方化的道路。

具体讲，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农耕化、家庭伦理化。为此，坚守农本商末的基本国策。为什么要坚持农本文化呢？农本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足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况且要实现足食需要人的勤奋与节俭，勤俭可以提升道德，农耕生产有益于道德的养成。农耕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交换为辅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益心，而且健体，还有不违天时，因地而种，尽可能依靠畜力人力，不浪费资源能源，从而获得可持续的和谐发展。在这里，我认为“新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就是用中国文化化包括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更能体现习总书记的四个自信，也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天下性。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天下性、道德性、可持续性、农本性、家庭伦理社会主义性及一以贯之性与与时俱进性，这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有文化中最具有现实价值的文化，其现实价值在于能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生态危机、道德危机、核竞赛危机、经济金融危机和人异化等危机，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统领世界180余年，中国文化虽然有一段处于与西方文化的对峙期，但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我们无限制的接纳西方文化，以西方为标准，致使这些危机在中国表现的更加严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体现的在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没有体现中国文化的一般性与普世性，一个没有一般性与普世性的文化怎么能引领人类呢？中国文化一直讲是合于道的文化，既然合于道，必然找到了人类发展的本根，也一定无不由也,无不通也。中国文化讲事物一太极，事事无碍，物物无碍，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当中一定具有无所不由的一般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引进中国，并在中国能生根发芽结果，正是被中国化的结果。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完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使命中，不仅要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还要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及伊斯兰文化等，如此才能形成全人类的主流文化。我们必须有中国文化固有的大格局大使命，以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高屋建瓴、由近而远地复兴中国文化。文化自信了，道路才能自信，文化与道路自信了，我们才能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以向外学习、向外引进为主的文化不自信状态，而使自己变成向外输出文化的自信状态。

今天我们仍要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我们要升级版的改革开放，将引进效法西方而变为向西方输出，以推动文化复兴为使命，变被动接纳为主动出击，以君子上达的精神成为全人类的榜样。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何来廉政？中国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道德文化，就是以培养礼义廉耻仁孝为主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将道德与学科相分离，视学科为工具，从而使心与物分离、道德与政治、经济分开，将人生终极价值置于对于权力与财富的追求，并且不惜与道德、法律进行博弈。可以说，我们引进的愈多，我们的廉政状况就越糟糕。西方对于我们的价值仅在于西方的侵略性以及侵略工具的先进性，我们为了反侵略，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角度讲，我们有必要跟踪其科技动态，并且深入研究，不断创新，能生产出比他们更先进更有打击力震慑力的武器来。

**（二）以礼法合制替代西方化的以法制国。**

中国文化起源于农耕文化，完成于家文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随，推扩至天下则君礼臣忠，互敬互爱，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伦理道德所体现的精神是相感，“仁”之本意就是两人相遇而感，仁是由孝悌而来，所以说“孝悌也者为仁之本欤！”也因此说“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既然天下是一家人，就应以五伦相对待，建立在五伦基础上的规范体系就是礼制，配合、辅助礼制，对于屡教不改者动之以刑，则叫法，法如同家法，是用于对付凶顽之子的，两者合起来，就构成中国古代的礼法合制体系。所以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以礼法治国，得到的是德义的积累，而以法治国得到的不是教化，而更多的是强制。况且西方之以法治国，其条款常常与伦理道德相脱节，工具性强，欠缺情理。还有法庭辩论都以争为精神，是力量的博弈，往往对强词夺理者、诡辩者有利。这些与中国文化中注重礼让谦虚、反求诸己的文化格格不入。还有礼法合制管理成本低，以法治国管理成本高，试看今日法院（司法机关）编制增长的速度与律师人数的增长远远跟不上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社会怎么能承受得了。可以说以法治国并不能彰显道德伦理与社会正义，而且愈走愈远离道德，廉政建设适合于礼法合制，益于人的道德自觉，一个欠缺道德自觉氛围的社会，很难培养廉政的社会风气。

**（三）将廉政建设落实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之中。**

落实在生活方式之中，就是要树立廉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人生之福报皆在为公为民的事业上，而不在为私为己的私人事业上。真正做到廉政，就必须过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生活，具体言之，首先，勤劳可以使人向善，勤劳可以改变人的思想，人的勤劳尤其在农耕劳动中，可以知稼穑之艰难，知道农民之不易，父母之艰难，从而乍然产生同情心，一旦有同情心，善心自然升起；其次，勤劳能使人阳气增加，阳气增加，思考问题则积极，思考问题积极，则此心光明，易产生济世救困的仁义心；再次，农耕劳动向内求，求诸自己之勤奋，不像商业活动求诸外，向外求必离本心远，真如老子说“其行弥远，其知弥少。”向外求必使人心向恶，向内求必使人心向善，所以农耕者质朴心善；复次，勤劳会使一天无空暇，无空暇淫逸之心难生；第五，农耕劳动可以足食，足食者心自安，仓廪实而知礼节，知礼节者德必厚；第六，农耕者不违农时、因地而种，知天知地，以天地为法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第七，农耕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监督少，自觉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伦理观念伴随劳动而益深入，伦理益深入，道德人心自然日益启发扩充坚固；最后，劳动益于健体，心善体健，久而久之必为良善君子，岂止于廉政？试想一个贪图生活奢华的人，岂能满足于国家给予的工资报酬，这些工资报酬又岂能支撑他的奢华生活。在不能满足其奢华生活的境遇下，又岂能不贪呢？

**（四）不可忽视文学艺术对廉政建设的影响。**

文学艺术一定要坚守“尽善尽美”、道艺统一、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文主义原则，上薄拜神，下防拜物。现在很多文学艺术作品已丧失道德原则，滑向拜物主义的泥坑。娱乐色情化，错误的把大众化理解为庸俗化低级趣味化，走向了“小人下达”之路，向社会释放负能量的东西。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气，为贪婪为满足物欲为腐败找借口找理由，致使腐败合情合理，生活奢侈成为人们生活的目标。在西方商业文化引领下，奢侈已成为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合理合情的学术原理，在这些学术原理的影响下，一些干部忘记了自己高尚的理想，纸醉金迷，将自己的权力变成捞取财富的工具，胆子之大已无视法令，脸面之厚已不知廉耻。我们正处在中西交汇的境遇下，我们必须坚守节俭的美德，要认识到是非观一旦颠倒，廉政建设将失于基石。所以要坚守为人民奉献的精神，对一些义利合一、先义后取的商业人物可以歌颂，对那些无义之奸商、巧取豪夺之诈商必须以春秋笔法鞭挞之，从而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五）要占领网络优势，以正压邪，以善惩恶，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网络是信息交流的平台，也是文化较量的平台，同时又是争夺人心的平台，还是商品流通、资本聚散的平台，当然也是邪恶与良善博弈的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如何将正确的价值观输送出来，影响人们朝着善良、诚信、正义的方问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网络仅是一工具，本身没有灵魂，但是网络上承载着数以万计的信息却良莠不齐，有善有恶的，随时影响着我们的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也随时发挥着影响我们生活状况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分清善与恶、敌与我、分清诚信与欺骗，分清适合与不适合，总之要分清是非，肃清奸恶，使正能量的信息得以传播，邪恶的、负能量的信息被限制甚至被禁止，久而久之，一个朗朗的网上乾坤才会出现，网络世界清明了，就会为廉政文化开辟一个清明的天地。

**（六）将廉政建设落实在领导体制的改革上。**

在中国历史上，领导体制有二种基本的模式。一者禅让制，一者世袭制。禅让制，任期很长，尧在位七十年，舜在位三十三年，任期长，治理天下就不会急功近利，不仅有战略，而且可以推进战略的实施。禅让制推行是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就是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兼听而明，所谓集中则是集中决策，独断乾坤。禅让制在接班人的选拔上是由领导者直接指定，不用隔代指定。这样有利于政策的延续，也有益于领导权威的加強。禅让制之后的世袭制在任期的无限制方面、民主集中制以及不隔代指定接班人方面基本是相同的，所不同是禅让制选择接班人以天下为视野，不搞世袭制，而父传子的世袭制则局限在父子之间，选拔的原则虽以嫡长子为常规，但在诸子中择其贤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领导体制的无任期限制、民主集中制与接班人的不隔代指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心存投机与侥幸心理的干部是一有力的振慑，极大促进了廉政建设的发展。

**（七）落实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上。**

廉政建设是一持久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娃娃抓起，对于青少年要从小培育其孝忠、仁义、智勇、廉洁奉公的品德，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理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孝友均勤俭、仁义礼智信十德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廉政建设打下良好的人才基础。

**（八）落实在乡村振兴上。**

乡村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没有乡村，天人合一的环境如何保持？没有乡村，安全粮食如何解决？没有乡村的农耕生产，勤俭孝悌的美德如何培育？“父母在不远游”之孝行，在人口流动性极强的城市是不可能实现的。家庭手工业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在日益大工业化的城市必将逐渐消亡，伴随小农经济的消亡，家庭伦理也将渐渐不复存在。孝悌之道是一切道德的源头，无此源头，忠于人民、奉献社会的优良品质从何而来？可以说一旦乡村消失，孝悌廉政文化便无土壤；也就是说，乡村不能振兴便无家庭伦理的生成条件。乡村建设不仅是足食之本，足兵之源，还是廉政文化生成之土壌。

综上所述，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在与西方商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廉政建设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要见贤思齐，而且要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抵制更多的诱惑，要比以前没有改革开放时付出更多的努力。要建立完备的抵制精神污染、抵制自由化、抵制个人主义、抵制拜物主义、抵制色情引诱及抵制工具化的知识体系，还要抵制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抵制因贫富差别带来的心理落差与怨恨，抵制权钱结合而形成邪恶势力带给我们工作的威胁与障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以前只要遵守纪律，素位而行，紧跟组织步伐就很难犯错误，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就必须要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境界，才能做到忠于人民、忠于职守、不腐败，廉洁奉公，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在以前只有一种力量朝着一个方向拉着大家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走，而现在则还面临另一种力量把大家朝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对此，就必须克服诱惑，辨清是非，坚定信仰，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阵营。总之，必须提高认识，既要学习正确的，还要抵制错误的，不仅要传播正能量，还要抵制负面能量。以君子上达的精神，学习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同时不仅要接纳，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商业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等，在比较学习中树立“四个自信”，在接纳交流中学会找到文化的会通处，进而将其中国化。从而将廉政建设落实在“日三省吾身”的修身上，落实在坚定的信仰上，落实在日常的生活方式上，落实在中国化的礼法制度上和中国话的文学艺术上，落实在网络安全上，落实在教育改革上，落实在乡村振兴上等等。时刻警惕尘埃的浸染，修己安人，树立为人类服务的伟大理想，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兼而备之，这样，我们才能搞好我们的廉政建设，提升我们的廉政水平。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汤用彤国学院院长、全国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基地首席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企业发展与廉洁文化建设分析

**包卫兵 包秀文 徐培华**

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文化作为历史现象，既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具有现实的时代性。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的起源、演进和发展都有其自己的轨迹和脉络。我国是有着深厚廉政文化基础的国家，形成许多博大精深的“廉说”、“廉论”，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随后发布的全会公报在2019年的工作部署部分专门强调“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全会闭幕仅3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银行纪检监察组、上海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李杨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本质要求。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谐企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处理内部关系、内外关系时要体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企业，就是要把企业建设成为“循环发展、遵章守法、诚信至上、团结协作、关爱员工”的企业。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干部违规违纪，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不是和谐；腐败案件时有发生，职工群众反映强烈，不是和谐。一句话，腐败不是和谐。企业不和谐，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成为发展的绊脚石。当前，企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利益观，办事公正，行为廉洁，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开展廉洁文化建设，通过健康向上、生动有效的文化活动，大力宣传廉洁知识、廉洁要求、廉洁理念等价值取向，有利于营造崇尚廉洁的企业健康发展氛围，有利于促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的生成，使廉洁意识和廉洁观念成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准则和自觉追求。这种廉洁意识和廉洁观念一经形成，就会转化为党员干部廉洁从业的自觉行动，在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中形成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良好习惯，在思想认识上解决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和有效防止腐败的问题，从源头上减少各种腐败问题的发生，维护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促进党群干群血肉联系和企业壮大与科学发展。

2.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是构建惩防体系的基础工程。廉洁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教育的基本手段，中央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教育为先。这是因为，一方面，制度功能的发挥需要教育作基础；另一方面，监督要发挥作用，真正到位，需要教育作保障和支撑。作为反腐倡廉教育的基本手段，廉洁文化建设开阔教育的视野和领域，丰富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有利于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制度意识的培养，执行力的提高，有利于监督氛围的营造，有利于领导干部在监督之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养成。

廉洁文化建设是构建惩防体系的重要内容。廉洁文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相传承的文化形态，是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理念。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廉洁文化的作用在于为教育提供思想内容，为制度提供精神支撑，为监督提供价值标准。廉洁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使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工作有形化、具体化和群众化。

3.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企业竞争力的内涵有多种，但最核心的是人的因素。提升企业竞争力，关键是要打造一支能战斗、能吃苦、凝聚力强、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经营意识的干部队伍。作为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有效途径，廉洁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导向、激励、约束、凝聚的功能作用，通过积极培育党员干部的廉洁从业理念，用健康向上和先进的廉洁文化占领思想阵地，有助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腐朽落后的思想意识，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荣辱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增强企业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勤廉敬业。各级领导干部以其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广大职工群众，营造勤奋、敬业、廉洁氛围，内强企业素质，外塑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4.自觉践行“讲政治、知敬畏、守规矩”。企业各级党组织要持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持续纠治“四风”问题新表现，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一是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一岗双责”。企业各级党组织要统筹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结合企业工作实际和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细化责任清单，层层落实“一岗双责”。要抓好本级、带动下级，从具体的工作入手，提高大家把握大局和方向的政治能力、政治水平。二是坚持领导带头，发挥“头雁效应”。 企业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带头抓好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传递责任压力，以永远在路上的心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以党风廉政工作护航企业工作。三是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企业“一把手”违法违纪问题有所凸显，要认真抓好预防，结合审计、巡视、巡察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突出对企业“一把手”的监督，强化对“三重一大”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的监督，严禁出现“集体闯红灯”等现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要严于律己、做好表率，主动接受监督，让被监督成为一种自觉和习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二、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是企业健康发展的灵魂**

人的因素是最复杂的因素，人性是复杂的。只要有人，腐败就会发生。2019年8月30日，万达集团发布内部公告称，8月30日万达集团召开廉洁与遵章守纪教育大会，经集团审计中心查实，商管集团原总裁助理兼华南运营中心总经理王某、武汉区域原招商营运副总经理密某、黄冈万达广场原总经理付某、孝感万达广场原招商营运副总经理张某严重违反集团制度，向商户、供方及员工索贿，金额巨大，已涉嫌犯罪。目前，万达均与上述4人解除劳动关系，并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重整行装再出发，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廉”不仅是国家的重要价值导向，也是治国安邦的基本准则。建设清廉政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和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和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旧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内腐败透顶，对外昏聩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龌龊”，而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1.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我们党因革命而生，勇于自我革命是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里的政治基因，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胜法宝。据人民网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就至少有70名国企“老虎”被查处，广泛分布于能源资源、通信、金融、传媒、运输十余个领域。其中能源资源领域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四个行业有17人落马。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原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中石油高管涉嫌严重违纪，先后落马，让人触目惊心。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指出：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企业，引导企业廉洁诚信、依法经营。当前，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对于构建和谐企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抓好活动开展，注重突出重点。廉洁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教化和养成的过程，是一个厚积薄发、不断渗透的过程。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洁文化建设活动，是营造廉洁氛围，搞好文化渗透的基本途径。当前，要在开展廉洁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围绕反腐倡廉工作任务，重点开展廉洁文化进机关、进岗位、进社区、进家庭活动。一是进机关。机关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结合实际，区分层次，增强廉洁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利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群众路线、“三严三实”等教育实践活动，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勤政意识，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尊廉、崇廉、守廉的良好风气，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二是进班组。坚持利用支部党课、学习培训、专题讲座等形式，利用班组、车间宣传栏、黑板报、橱窗、画廊等阵地，对班组、车间的党员干部进行廉洁文化理念和制度的宣传教育，在班组、车间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三是进岗位。岗位是廉洁文化建设的关键领域。把廉洁文化建设与创建党员先锋岗和精神文明岗相结合，强化遵纪守法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结合不同管理岗位，制定具有管理岗位和重要工作岗位特点的从业行为规范，把廉洁从业的要求融入岗位职责，有针对性地开展好经常性教育，提高执行制度的自觉性。通过在关键岗位设立“廉洁提示牌”，张贴与岗位相关的廉洁从业格言警句等，发挥廉洁文化对岗位人员的渗透和教化功能。四是进社区。社区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开展廉洁文化“进社区”活动，就是把廉洁文化建设与创建文明社区、安全社区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展播廉洁文化公益广告、布置廉洁文化景观、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廉洁文化活动，加强社区廉洁文化建设。五是进家庭。廉洁文化进家庭，可以使廉洁文化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以创建廉洁家庭为目标，开展多种形式的亲情助廉活动，共筑家庭廉洁防线。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召开廉洁座谈会，使领导干部能算清政治帐、经济帐，自觉保持廉洁，远离腐败。

3.抓好阵地建设，丰富文化载体。廉洁文化阵地是培育廉洁从业理念、开展廉洁文化活动、接受廉洁教育的重要载体。一是抓好舆论阵地建设。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简报、宣传橱窗等文化资源，发挥这些阵地组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开办反腐倡廉专栏，弘扬廉洁思想，传播廉洁文化理念，营造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运用廉洁文化专题网页，发挥其内容鲜活生动、真实具体的特点，拓宽反腐倡廉的宣传渠道。有针对性地编辑符合企业实际和发展的廉洁文化教材，购买廉洁文化方面的书籍、印发廉洁文化宣传手册等。

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必须抓住“关键少数”。贯彻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关键作用。职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要以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为全党带好头、作表率。惟其如此，才能在层层示范、层层带动中，形成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强大势能；才能在深学笃行、知行合一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三、与时俱进推进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工程**

改革开放43年，经济高速发展，GDP快速提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审时度势，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却存在人的价值观扭曲、伦理道德败坏，社会诸多问题影响着人民的幸福指数。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企业廉洁文化与美丽中国建设融合发展，在“善”与“恶”、“义”与“利”、“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抉择等选择中做出为美丽中国而建设的奋斗目标。

1.道德性是廉洁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着力点是要提高企业从政人员道德素质，促进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我国传统文化把自律、自省、修己视为做人、做事与帮助教育别人的基础和根本，把“德政”和“政德”有机统一于治国安邦的为人和举事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更是语重心长地号召大家“要学习伦理学”，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对企业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给人以鼓舞，纯洁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理智，正确的道德规范给人以准绳，高尚的道德素质能更好地约束自己做到谨慎用权，守住防线，修正自我，廉洁从政；对全社会来讲，企业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对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官”气正则民风清。而为“官”和做人两者息息相关，德是人格力量的具体体现，人格支撑“官”德，人品提升“官”品。

2.深入进行“三严三实”和反腐倡廉教育。从中央巡视和查处案件情况来看，金融领域腐败问题仍比较突出。一些金融监管机构、金融企业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少数金融领域领导干部和从业人员“靠金融吃金融”，利用手中掌握的金融资源、权力，大搞幕后交易，大肆侵吞国有金融资产；金融圈子小，同学、师生、同事、亲友等裙带关系交织，廉政风险容易相互传染，利益板结化突出，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之间亲而不清、公私不明，容易形成利益团伙等。因此，“三大攻坚战”中，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首当其冲，一旦处理不当，必将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大局的稳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必然要求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来统筹反腐败和防风险。

春风浩荡满目新，扬帆奋进正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习总书记要求“官商相敬如宾”，就是从腐败多发的敏感环节发出警示，就是告诫全党同志与物质诱惑保持距离，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戒非分之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官商交往不能“浊如酒”，而要“淡如水”，这样才有利于保持头脑的清醒、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对人民的敬畏、对历史的敬畏。干部自重才能受到老百姓的尊重，“官商相敬如宾”就是在告诫干部要学会自重，就是在教育干部要学会用“瓜田李下之嫌”婉拒商人的“好意”，做到一身清正、一世清白、一方清明。

3.健全廉洁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数据显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已达70余人。2018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59.9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17.6万件，谈话函询24.2万件次，立案46.4万件，处分40.6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4.2万人)。廉政文化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努力构建“大宣教”的工作格局，整合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会以及其他政工部门的职能优势，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构在反腐倡廉教育、监督、惩处方面的作用，发挥宣传部门在企业文化建设以及利用各种媒体的宣传作用，发挥组织部门在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工会组织在开展群众性娱乐性教育方面的作用，形成党委领导，党政共管，纪委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的廉政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纪委要主动承担牵头责任，积极发挥协调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加强检查考核，确保任务落实。其他责任部门对照分工，积极承担责任，认真落实责任。建立廉洁文化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和指导廉洁文化建设工作。

4.建立廉洁文化建设经费和考核激励保障机制。密切联系群众，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群众保证。廉洁文化建设需要群众的积极支持、热心参与和自觉行动，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把企业廉洁文化建设与完善权力约束机制结合起来，确保权力运作的规范有序。加强舆论宣传监督、群众监督、民主监督以及党组织监督，通过开展党纪教育和普法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法制监督意识，提高依法办事的责任和能力，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全体员工坚持不懈，共同努力。坚持把廉洁文化作为企业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长期性工程来抓，使廉洁意识内化为思想准则和道德准绳，外化为倡导廉洁的自觉实践，让廉洁文化在企业生根，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和层面，为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文化支撑，通过持续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使企业形成“以廉为荣、以廉为乐、以廉为美”的健康发展氛围。廉洁文化建设离不开物质财力支撑。各级领导干部在狠抓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重视和支持廉洁文化建设。

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廉洁文化建设是建立和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企业在文化引导、制度健全的同时，注重制度的执行和监督，保证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努力形成廉洁文化建设的科学机制，促进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切实把廉洁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改革发展的总体部署，融入反腐倡廉建设各个方面，树立廉洁理念，弘扬崇廉风尚，促进廉洁从政，我们要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坚决清除一切腐败分子，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作者包卫兵系江苏省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阴分局工程师、副主任，包秀文系东南大学研究生,徐培华系民进江苏省淮安市委高级讲师、副部长）